

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与综合发展

[作者] 胡鹏林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文化思潮对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适应这种语境,文学理论首先需要具备开放性,表现在具体操作上:一、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坚持主体性与多元性的统一;二、处理好三个文论传统和三个文化质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当代转化问题;三、坚持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和跨国界的研究视野;四、密切关注语言形式、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互涉、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在历史精神、人文精神与艺术精神之间寻求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宏观构架,促进文学理论的综合创新。

[关键词] 全球化,开放性,三大母元,文化研究,综合创新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

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压缩了,全球化趋势不可抗拒的随之而来。然而对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各界反应不一,观点各异:一,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它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阶段,其主要着眼点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并认为将会向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扩展;二,第三世界学者认为全球化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获取了经济和文化上自由平等的发展机遇,企图在全球化背景中促进区域性的发展;三,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中,尤其要保持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清醒,以历史意识和文化价值抵御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的侵袭,力图一分为二地对待全球化的到来及其影响。

从上面三种不同的理解可以看出,人们对全球化是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角度进行阐述的。雅克·德里达指出:“目前阶段所谓的世界化或全球化,……语义上讲,全球化在英语里是‘globalization’,德语里是‘globalisierung’,中文里也许与地球有关。但法语里我们说‘世界化’,就使用‘世界’这个概念,我偏好这个概念,因为它迫使我们提出‘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不是宇宙,不是地球,不是普世,……世界是人的集合,人是上帝造物大家庭中富有博爱精神的造物。”他把全球化和世界化区分开,全球化是指形而下的电子技术在社会领域中的物质影响,世界化则指人在社会中形而上的价值观和文化意义上的诉求。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全球化语境分为全球化和世界化两个层面。

二十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尤为巨大。从形而上的角度讲,强势文化(狭义上的文化)移入弱势文化区,产生一种文化霸权的压制,于是产生两种思潮:一是文化霸权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前者指强势文化实施的一种文化压制,遏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后者指在强势文化的压制下,激发了弱势文化地区的民族意识,甚至不惜强化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来抵制文化霸权,却同时陷入了文化保守主义,与世界文化产生对抗与冲突。

文学是文化的声音,全球化语境中产生诸多文化矛盾和危机,“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但是全球化语境中我国文学研究并未成为过去时,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文化的现代化也源于其自身的困境。怀疑现代性这项设计的原初动机是与社会化的结果无关的,它处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前景内。”

社会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性并不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每时每刻都左右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和文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上存在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相对主义是以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决定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并且只能同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不可能存在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这种基本观点有利于各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学内部的综合研究。但是,承认不同文化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去评判另一种文化就会导致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纯洁而反对文化交往也导致了文化的隔绝和孤立。这种矛盾状态使文学研究缺乏一种开放性思维,封闭的文学研究只会导致文学的终结。“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价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由此既肯定了不同文化的各自价值,又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文学研究不仅能立足本国文学实践,建构本土化和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还时刻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动态,在丰富世界文学研究的同时加强不同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全球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传统是导致几千年世界文化格局多元化的源头。在全球化语境中,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后殖民主义国家文化迅速崛起,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使欧美强势文化开始关注世界各地文化,从而为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

由此可见,全球化语境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是文化与文学的世界化和多元化。在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革新,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方面,将会在“大文学观”的视界中把广度和深度、动态和静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文学理论的广采博取,多方吸纳,融合同化,综合创新。

现代文论的开放性与多元发展

被成为理论的东西的影响往往超出它们原来的领域,其他领域的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作的分析都为文本问题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因而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理论也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其他领域。正如艾略特所说:“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这种开放性的交流在文学理论中同样适用并且必要,钱中文先生认为:“所谓开放性,主要就对话与独白比较而言。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一种开放性的关系。”文本作为表述,显示了其潜在的双声性、对话性,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交流,无疑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不同美学思想之间的对话。因此,从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文本层面上看,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是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世界性和开放性成为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的全球化语境中,开放性与全球化更是互动互涉和紧密联系的。

然而值得反思和内省的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依然存在,甚至出现蔓延趋势。西方文学理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流派众多、主义纷呈: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历史批评因为忽视了文学的根本属性和组成材料,否定了文学性导致后来的“语言论转向”矫枉过正;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把文本的内部的语言分析推向了极至,却又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七十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再次回到世纪初的源头,但是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而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外部研究,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开创了新的文论学理系统。虽然其间也有各种流派在各自的理论体系内取得重大成果,但是这种文论研究是以“片面的深刻”为代价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论研究是不允许封闭地单线发展的。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演进过程。从文论自身发展来看，中国文论也是由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但是这一过程与西方文论进程发生了两次错位。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文论注重社会历史研究，而西方则正经历着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内部研究。而当西方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回归：回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的时候，中国文论此时却又封闭起来研究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内部的”文论系统，因而形成了中西文论的第二次错位。从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看，中国学术界正在兴起“文化研究”的热潮，把文学同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期望争取更大的学术权力和扩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空间，而西方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泛文化”的弊端：文化研究的无限扩展，不仅会失去自身的学科地位，甚至会涵盖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走向终结。这种情形有可能成为中西文论的第三次错位。错位就意味着封闭和缺乏交流，如此一来就会阻碍文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和综合创新。从文学理论发展的外部政治环境来看，中国与欧美、苏联（俄国）等国家的关系以及本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中国文学理论或西化，或苏化，或极端政治化，这种演进态势不利于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开放性和独创性的发展。

单就中国文论的这种发展态势而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心主义和自卑主义思想。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中心主义意识和社会封闭状态是相互支撑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大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使中国人产生“天下之大，惟我独尊”的意识，文学理论在这种中心意识和封闭状态中总是表现极端的政治化。另一方面，自卑主义也是开放性文论研究的巨大障碍。季羨林先生谈到：“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只有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因此，必须克服自卑的倾向，不能只是盯着西方的理论，或跟着说，或接着说，形成不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当前的文论实际，建构本土化和主体性的话语系统，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西方对着说。

从上面对文化视野、文本层面、中西文论历史教训和外部环境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窥见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文学理论开放性研究的具体操作上，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加以分析：

一、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研究必须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坚持主体性与多元性的统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论面对西方各种文论思潮的冲击，逐渐产生一种“影响者/接受者”、“外国/中国”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二元对立要么坚持外部研究或内部研究，要么坚持中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总之是在对立的各自封闭的二元体系中进行孤立地研究，导致“国学热”、“西学热”和“马学热”在文论界轮番坐庄，却始终没有开放性地融合而产生多样化的创新。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构成都呈现多元、多极和多维的格局，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但是中国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种多元格局的文论思想有其深刻的背景。就中国而言，多种经济成分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混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与纷争，都决定了我国文论必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但是，这种多元化格局又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主导、主流和主潮。中国文论多元化格局中必须存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因素，同时在与全球化语境中的各种文论系统进行交流与对话，保持自身学理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整体性。因此，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主体性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

二、正确处理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以及三个文论传统和三种文化质态与文学理论开放

性研究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开放性表明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尽可能放弃对‘大而全’的理论格式和包容性内容的追求”，似乎开放性是以牺牲包容性为代价的；事实上开放性是以主体性理论为基础，借鉴其他理论的可取之处，包容其他理论的“片面的深刻”的一面，求得理论的综合与创新。

三个文论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和西方文论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是汉民族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源头，其现代转化后的新形态将成为现代文论的新力量源泉；中国现代文论传统是白话文学的理论和西方学理系统结合的成果，与当前文学及其文论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是文学理论开放性研究的基石；西方文论传统则是我们开放的主要对象，是我国文学理论的参照系数，两种或多种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的交流，也是开放性研究的宗旨。此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文化质态即“国学”、“西学”和“马学”保持着相互对峙和交融、悖立和互补。“国学中心论”和“西学中心论”都是行不通的，昏昧的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盲目的媚外主义和排外主义也是不可取的。从理论上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和文论系统应当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文学理论应以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马学为本”，兼顾“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文学作为一种以审美为特征的精神活动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理应以开放的眼光，广泛地有鉴别地选择和批判地吸纳，承接中外一切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用来发展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和文学理论形态。

三、坚持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和跨国界的研究视野。

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的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具有相同之处，即面临整个人类，必然是跨民族的、跨文化的，文化习俗、价值取向等等都影响着文论研究。如中国吃饭使用木筷“粘”，而西方则用刀叉“刺”，中国演员惟妙惟肖地模仿，而西方演员则表现自我，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是感悟、直觉和体验，而西方则是解剖式地分析，中国文论追求大同、和谐与一体，而西方文论则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因而跨文化研究是对文论开放性研究的深入，是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理论的相互学习、借鉴与更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中，国界的模糊，语言的翻译，使不同语言和地域的文化体系中的文学理论相互交流，为开放性的文论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方法论上的支持。此外，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等学科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产生了一些新的综合学科和研究方法，为文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学术话语。

四、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研究必须正确认识文学语言形式、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互涉、互补关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必然有交流对话，因而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必然有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可见文学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是相互开放、影响和促进的。文学的效果来自某种语言话语和社会历史的认同，文学理论必须分析文学如何历史地存在；同时文学理论又不可能绕过语言形式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文学理论与语言形式、社会历史的开放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詹姆斯指出：“通过揭露先在的符码和模式的存在，通过再度强调分析者本身的地位，这里预见的阐释学将重新把文本和分析过程向历史趋势开放。……在我看来，唯有以这种发展或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明显无法比较的要求才可能得到调和。”（《语言的囚笼》）他还提出以积淀的形态来代替文类或叙事形式的概念，而文类被重写为社会象征信息和叙事结构的综合，充满了生活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容。

母元系统与综合创新

综合与分析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预测，较之于二十世纪来说，新世纪必然是走向综合或有必要和有可能进行综合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在已经取得的文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梳理、鉴别、分析、提炼和概括，融入新的学理系统中，运用宏观的辩证思维进行综合与整合，创立和建构起更加完整的科学的宏观的文学理论形态。

我们以为，人、史、美是文学的具有源泉和根基性质的三大母元，表现出三向度的多维世界：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与美的关系；也可以归属为三大文艺理念：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与此对应的是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历史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我们把历史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完美融合作为文学理论综合创新的目标。

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指人为了适应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发展前景而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的总和，其终极目标也是追求一种合目的性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因而美学观点和人学观点、艺术精神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所以文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艺术精神与历史精神。

关于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观点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辩证的观点，在文学研究中也必须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价值取向。其次，应当看到历史理性扭曲人性的一面，因而必须充分发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功能。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对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虽然人的能力得到最成分的发挥，同时人性也遭到最残暴的扭曲，人在社会历史中被异化了。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人忍受着人格化的“物”的挤压和摆布，整个地被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历史所吞噬，人被异化为“非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贴切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我们强调一种综合的研究姿态，反对以人文精神失落和道德滑坡为代价的单一维度的历史理性。“观乎人文”，才能“化成天下”。历史理性必须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基础上的历史理性，人文精神也是以历史观点为出发点的新人文精神。人的合目的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一致是两者统一和交融的内在依据和契机。

关于艺术精神和历史精神。文艺创作及其研究活动既是以审美要素为特色的历史现象，又是以历史因素为内容的审美现象。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史上出现的“社会历史形式结构社会历史”的焦点的转移，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对艺术精神和历史精神的辩证统一理论的实际操作。事实证明，如果以审美分析消解历史分析，就会导致非功利化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而忽视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如果以历史分析取代审美分析，极有可能诱发狭隘的物质与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庸俗社会学。在全球化语境中，还出现了一种诅咒、逃避、消解和重塑历史的非历史化和反历史化倾向，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流露出的历史悲观和虚无情绪，完全否定了文学研究和思维的价值，对整个文论系统的颠覆和破坏性是可怕的。

总之，文艺的非历史化、非人文化、非审美化，或完全历史化、人文化、审美化都是不妥当的。只有历史的、人学的和美学的观点的辩证统一，才是对三大母元系统框架的建构，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文论综合研究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文化研究呈现迅猛发展的趋势，对文学理论研究冲击极大。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非学科”，也有人认为文化研究代表了文学理论综合发展的方向。对此，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从方法论角度看，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理论开放性研究的大综合。文学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

出各自的诠释并相互交流对话,使文学理论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中进行综合研究成为可能。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就是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中才得以发展的,把文化的典型产物作为‘文本’解读;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把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文化研究旨趣涉及话语与文本性、大众文化问题、性别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美学政治学、文化政策、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等,从多样化的文化和理论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又通过参照文学文本来分析文化现象;在两者共存互补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大文学观”,以此指导和建构文学研究的综合理论体系。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文学的研究范围,模糊了文学理论综合发展的方向。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是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研究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涵盖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也因此总是被社会权力关系的术语加以诠释,逐渐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显然,这种综合研究与文学理论根本属性相悖。再次,文化研究中有两种思潮是文学理论综合研究所不能接受的。一是后现代化思潮。众多学者争相讨论后现代性及其在文化和文学上的意义,宣扬一种反叛、离异、虚无的思想。这果真是中国的思想现状吗?后现代思潮是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当前中国没有其存在的根基;而且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后现代的危害并逐渐加以重新诠释。因此掀起这种后现代化思潮,完全是一种超前的思想文化消费。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潮。如道家思想近年来在西方掀起热潮,其目的在于消解外部世界对人的精神的压抑,安顿焦灼的疲惫的心灵,但是其非科学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儒家思想同样也存在着批判地继承的问题。这些都关涉到了文学研究的文化和理论上的立场和发展导向。因此,在文学理论的综合研究过程中,既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更要批判其中非历史化、非人文化和非审美化的倾向。

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趋势更加强化,在全球化语境中文论思想也各有不同。如钱中文新理性精神的文论思想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对话精神和新人文精神的融合,童庆炳的文化诗学从文化视野的宏观角度深入文学特殊性的微观层面,等等。但是他们无不是在开放性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着综合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文学理论的学理系统的开放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22